

倪 匡
蔡 澜
古 龙
李 敖
吴 清源

生 匡
羽 澜
梁 古
倪 李
蔡 吴
古 邵
李 冯
吴 陈
清 其
源 世
夫 庸
源 驥

金庸

自个儿的江湖 (上)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蒋连根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匡
澜
龙
敖
源
清

梁羽生
倪匡
蔡澜
古龙
李敖
吴清源
邵逸夫
冯其庸
陈世骧

金庸

自个儿的江湖 (上)

蒋连根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引

子



《诗经》写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鸟儿呼叫也是在寻找友谊，何况人呢！何为“朋友”？就是“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依靠和帮助。早在少年时期，金庸就认识到，在友情中没有任何的利害观念。“人是不会懂得幸福的，如果没有与一个对你心中不存丝毫利害观念，却永远准备为你尽力的人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候。”他认为，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存在利害观念，不计较利益得失的。他在与池田大作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人之所以特别崇拜关羽，就是因为关羽这个人是重情义而轻利益。基于这种“重情轻利”的看法，金庸笔下的江湖，无论豪客还是大侠，几乎没有不爱交朋友的。换句话说，都挺喜欢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在他的笔下，《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搜刮钱财，本是个贪财好色的小流氓。但是，在面对天地会的好朋友的时候，他却出手非常大方，完全视金钱如粪土。同样，



虽然韦小宝是一个极其贪生怕死的人，但对于他的好朋友“小玄子”康熙，韦小宝也处处为他着想，甚至几次冒死相救，心甘情愿地为他挡刀剑。为了讲义气，韦小宝做起了两面派，一方面不肯刺杀“小皇帝”康熙，另一方面又不肯灭除天地会。最后，为了保住天地会众人的性命，他只能抛下全部荣华富贵，选择了避世隐居。虽然金钱和利益对于韦小宝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在更重要的友情面前，金钱和利益就变得微不足道了。韦小宝这个人的身上，集中体现了金庸重情轻利的友情观。

金庸曾经说过：“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明报》原总经理沈宝新，肯定是这些朋友当中的一个。

《明报》时期的金庸，一手办报纸，一手写小说，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这个时候的他，朋友圈几乎将港台文化圈名流一网打尽，一直延伸到了大陆乃至全球华人文化圈。

从《明报月刊》的部分顾问名单中就可窥见一二：余英时、柏杨、巴金、胡菊人、查良镛、董桥、杨振宁、饶宗颐、季羨林……金庸自己也在顾问之列，这是中国最一流的文化朋友圈。

相继与金庸合作过的《明报》历任总编辑：潘粤生、王世瑜、董桥、胡菊人、潘耀明……个个堪称香港新闻出版业的大将。后来创办“香港财经风向标”——《信报》的林行止曾在《明报》资料室做资料员，受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

《明报》自创办以来，副刊一直是“小说”、“杂文”两版。这两个版面专栏作者的聘请，一定是要经过金庸批准的。所以，长期以来，《明报》副刊的作者大多是金庸的朋友，如倪匡、黄霑、亦舒、董千里、林燕妮、蔡澜、温瑞安、陶杰等。温瑞安在香港漂泊不定，金庸“雪中送炭”，安排《明报》连载其小说，方才造就温氏武侠旋风。陶杰是金庸的忘年交，邀请他在《明报》当副总编辑，兼写专栏。黄霑给金庸影视剧的插曲填了十四首词，金庸认为他成就最高的作品是《笑傲江湖》插曲《沧海一声笑》。

倪匡说他一生最好的朋友是金庸，他的小说只在《明报》连载，大部分小说也是在金庸创办的明窗出版社出版。他给《天龙八部》代笔，他的妹妹亦舒也在《明报》开专栏，兄妹俩嫌金庸给的稿费太低，齐向金庸抗议，结果被金庸笑眯眯地挡了回去，到头来还是继续给金庸写专栏，因为是朋友——“文朋狗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龙。金庸封笔后写信向他约稿，请其为《明报》连载武侠小说。于是，《陆小凤》系列在《明报》获得空前成功。金庸既是古龙的文坛前辈，也是他的竞争对手，金庸愿意主动出让《明报》这一方阵地，让他发表代表作，这实在是大侠大义之举。

晚年的金庸让出《明报》，讲学于浙江大学，就学于剑桥大学，与池田大作对话，随马云“西湖论剑”……到处游山玩水，讲学访友，回味着他的既往友情。可以说，他仍然在继续着自己的游侠之梦，并且有晚年知遇，一直到现在。

另外，红颜知己也是不可或缺的大侠必备关键词。金庸笔下的大侠们，没有一个是孤独终老的，或多或少拥有一个或几个红颜知己，有的最终发展成了执手一生的爱人，有的保持着纯洁的感情，以兄妹相称，而有的则一直是无私的奉献，默默陪伴在主角身边，给予自己所有的爱，付出一颗真心，不求回报，也不求名分，只是守候与凝望，只为那一回眸的相思和那眼神交汇的心意相通。能拥有这样的红颜知己应该是幸福的吧，她们所给予的感情早已超出了狭隘的男女之爱，而更多的是一种知己之情，挚友之情。

金庸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每个人，都是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名过客，有个小朋友问我，来生愿意做男人还是做女人，做郭靖还是做黄蓉？我说，不论做男人也好，做女人也好，都要做一个好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宣扬侠义精神的，本意基本与打打杀杀的‘武’无关……我主张现代人学‘侠义’二字，是补课，是主张勇于承担责任，拥有快意人生。侠义真的是个很远大很美丽的世界。”“我喜欢那些英雄，不仅仅在口头上讲侠义，而且在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而不是遇到危险就往后跑，我自己正是这样努力去做的。远离危险、躲在后面，这样卑鄙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多。”

很多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喜欢去猜测，金庸最像他众多小说主角的哪一个，是憨厚木讷的郭靖，是飞扬跳脱的杨过，是豪情万丈的萧峰，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还是乖觉油滑的韦小宝……其实，任何一位小说主人公都只是金庸性格的一部分。知遇而知己，是金庸性格的体现。

每个人背后都有他的故事，金庸写的故事已家喻户晓，而他自己和朋友们的故事，跟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

这就是金庸自个儿的江湖。



目录



金庸自个儿的江湖



引子/001

第一章 少年师友 / 001

师生办墙报，一同“喔喔啼”

——小学老师陈未冬 / 003

今来旧址忆故人

——中学校长张印通 / 008

百岁新郎是吾师

——中学老师章克标 / 014

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

——副刊编辑陈向平 / 019

金庸日记里的“浩弟”

——同学王浩然 / 025

“我们两个都写了十四部书”

——同学沈德绪 / 032

比赛赢球，你做前锋我当后卫

——同学沈宝新 / 037





第二章

患难知己 / 048

跟金庸“换位”命运便“转了向”

——被遗忘的作家李君维 / 050

金庸第一次婚姻的证婚人

——前辈同事许君远 / 059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武侠前辈梁羽生 / 068

侠骨文心可见报人风骨

——大公报人李侠文 / 079

《司马卓传奇》作者“郁秋”

——首任《明报》总编辑潘粤生 / 086

他揭开了“金学”序幕

——“代笔”倪匡 / 095

金庸自个儿的江湖
上



第三章

亦师亦友 / 111

最早认识金庸作品“天下第一”

——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 / 113

金庸最佩服的“棋圣”

——“大国手”吴清源 / 124

他首开金庸小说研究课

——北大教授严家炎 / 133

为了“金石姻缘”开张“金庸茶馆”

——“红学”专家冯其庸 / 145

他为镛记做了“射雕英雄宴”

——美食家蔡澜 / 154



半个世纪的老朋友

——电影江湖盟主邵逸夫 / 245

一面之缘，怨怼三十年

——“自由斗士”李敖 / 255

有情有义最像金庸小说里的杨过

——台湾作家林清玄 / 268

曾与金庸研究“玲珑棋局”

——棋界元老陈祖德 / 279

他比我这个“大教授”高一辈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 / 285

“明月”照耀下的“香港俞平伯”


——红学家林以亮（宋淇） / 298

记得金庸窗前那一盏孤灯

——香港女作家亦舒 / 310

金庸执弟子礼向他鞠躬

——洋导师麦大维 / 322

 第四章
武林盟友 / 163

为金庸小说“解禁”而游说

——台湾出版界“小巨人”沈登恩 / 165

金庸封笔后宗师传位于他

——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 / 175

读不进去鲁迅就读金庸

——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 / 183

在百家讲坛上说金庸

——“北大醉侠”孔庆东 / 193

“金庸茶馆”沏茶人

——高级记者万润龙 / 204

专挑金庸作品“骨头”的部落

——香港作家潘国森 / 215

朋友么，骂过了还是一对真兄弟

——金庸剧制片人张纪中 / 224

金庸喜欢“一床娇眷”那幅画

——“御用”画家董培新 / 234





少年师友 第一章

见面时，恭恭敬敬地鞠躬，离别时递上一张小纸条，将自己的寓所地址和床头电话呈上，这是金庸在寻师访友时常做的动作。

金庸有许多老师，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浙江嘉兴到重庆，从杭州到上海，从北京到香港，从台湾到英国剑桥，金庸到处交友拜师，因而有了许多“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

沈宝新与金庸是初中三年级的同班同学。金庸和同学合伙编小学升初中的教辅，赚了不少钱，还曾经拿钱资助过沈宝新。1948年两人在香港碰头，金庸看中沈宝新在出版、印刷方面的经验，拉他一起办报，于是这才有了《明报》。

和老同学聚会，金庸拉着儿子给同学沈德绪敬酒，说：“我们一道向沈伯伯敬酒，我的命是沈伯伯救的。”



✧ 金庸的江湖语录 ✧

✧ 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会时几乎已相隔六十年……另一位是中学的校长张印通先生，我因壁报事件被学校开除，张校长曾极力为我争取较轻的处分，后来张校长努力帮我转学，这份大恩大德对我一生影响极大……初中时的国文老师王芝篠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给我的主要是身教，他刚毅正直、勇敢仁厚的侠气使得我一生时时暗中引为模范……可惜这数位恩师大都已经逝世，虽欲报恩而不可得了。

——与池田大作对话

✧ 我的经验是，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的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的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与池田大作对话





师生办墙报，一同“喔喔啼”

——小学老师陈未冬

1992年12月初，金庸重返家乡。他在杭州茶叶博物馆参观时偶遇研究员陈琿，言谈之下，金庸惊喜道：“你是我的小师妹啊！”随即手书一封问候信，让带给他的小学老师陈未冬。

几日后，金庸回到故乡海宁，特意访问母校——今袁花镇中心小学，为学校图书室捐款，并题字留念：“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袁小旧生查良镛。”

1

袁小旧生查良镛的老家就在距学校三里多路的袁花镇新伟村，旧时称海宁县龙山里。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条小溪在两山夹峙之中流淌着，花溪两岸，秀峰林立，溪中礁石累累，水浅处可以涉足，水深处可以泛舟。山水交融，田畴交错，花溪的山与水都各具特色。

金庸七岁就读于村口巷里十七学堂，高小转入袁花龙山小学堂。龙山小学堂始建于1902年（光绪十八年），是海宁最早的四所高等小学堂之一，又名海宁第三高等小学堂。所以，查良镛曾对记者说：“我不是上私塾，我开始上的就是现代小学。”

龙山小学堂在袁花镇上，花溪河畔，杨柳依依，河水中漂满了绿色的浮萍，离查良镛家赫山房有好几里地，他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

“噢，金庸就是查良镛！”1981年7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的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居住杭州的陈未冬老人读后，想起他的小学生查良镛，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当有人告诉他金庸就是查良镛后，陈老先生感叹了一声。

陈未冬，原名陈维栋，1911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陈宅镇巽溪村一户农





家，1920年父亲不幸去世，留下了母亲和四兄妹相依为命。陈维栋进入附近学校读书学习时改名为未冬，后来考入了绍兴的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后在诸暨县枫桥的大东公学堂任教，一年后调海宁县袁花镇龙山小学堂任教。

陈未冬爱好写作，常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他见班上的“小秀才”查良镛人长得俊秀而聪明，写的作文尤为出色，便倍加赏识。陈未冬是班主任，教国文课，还教历史。金庸曾对池田大作说：“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会时几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记得当年他为我改正的作文错字……”六十年后，他仍记得一堂让他泪水横流的历史课。他回忆说：“记得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师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中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对于收回香港，自然反应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

少年金庸最爱去的是自家的书房，一幢盛满丰富藏书的屋子。书房里挂一牌匾，上书“澹远堂”三个紫色的字，是康熙皇帝当年为查升写的，三个字旁边有九条飞舞的金龙。查升是金庸的祖先，康熙年间大诗人查慎行之侄。查升这一代，一家叔侄五人（查嗣韩、查慎行、查嗣琛、查嗣庭、查升）官拜翰林，当时全家共有七人中进士，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是查家最显赫的年代。书房里还挂着一副对联，写着“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是查升的手笔。少年金庸常常对着牌匾和对联沉思，发愤读书的心境由此而生。如今，这副对联挂在金庸香港的书房里。

查良镛自小对书有一种亲切感，阅读课外书成了习惯。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的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除了家中的书，金庸还看了许多坊间的侦探小说、武侠小说。那时，社会还是非常的保守。当时《红楼梦》被视作诲淫的禁书，《水浒传》也是海盜的坏书，可在班上，陈未冬唯独允许查良镛一人阅读。

陈未冬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如此记述：“当时，查良镛（金庸）也在本校就读，是五年级成绩最佳的学生。他听课、做事都很认真，特别是作文写得好，我对他的每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社的骆文华，他看后也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



陈未冬的这一举动，竟然将查良镛的写作热情拨得更旺了。暑假以后，陈先生让查良镛跟他一块儿编五年级的级刊墙报，刊头上画的是一只大公鸡，取名为“喔喔啼”。查良镛组稿、编改、抄写，干得很欢。开头半月出一期，后来一周出一期，有时两三天出一期，把小小的墙报办得生动活泼。

那天上历史课，陈未冬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朝廷如何腐败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终因枪炮、军舰不及英国而惨遭杀害，突然情绪激动，掩面痛哭。金庸和小同学们也都跟着哭泣。金庸说：“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记忆里，小学上史地课，授课老师每次一说到战争、割地、赔款就捶胸顿足，常常我们所有同学也跟着哭，跟着愤恨不平。”这堂历史课映射出的国族危亡的险境，影响了金庸，也影响了那一代很多人的一生。

1936年，查良镛从龙山小学堂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二中（今嘉兴一中），自此与陈老师离别，查良镛离开了海宁。


2

1983年，陈老师因病住院，同室病友是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编辑，两人聊天，陈先生问他：“金庸是不是海宁人？”这位编辑也说不清，回港后便将此事告诉了金庸。金庸闻之大喜，写信寄往医院，此后，金庸托人再三打听，却未得到陈先生的消息。

直到1988年5月，陈老师获知金庸的确是海宁人，便写信托人寄给金庸，问他是不是龙山学堂的查良镛。10月14日，金庸复信问候：“生受老师教诲，已五十余年了，但老师的声音笑貌历历就在目前……当时我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颇加优容，此时思之，既感亦复汗颜。其后老师命生主编级刊《喔喔啼》，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忘也。当时老师在一黑色硬面蓝条簿上书写杂感，常以示生。我记得有文记叙校长张志鸿先生赴海宁县教育局追讨教师欠薪不得之情，老师自称为‘可怜虫’云云，迄今印象深刻。又老师是诸暨人，吾等袁花人将‘屎’读作‘窝’音，将‘尿’读作‘矢’音，学生等众口一词，老师大为生气。分隔五十余年，回思教诲爱护之恩，感怀良深。明年如能抽空，当来杭州叩见。奉上近照一帧，以代先此致候……受业弟子查良镛叩上。”信中既回忆当年趣事，更洋溢着对老师的款款深情。

事隔不久，有同事赴港，陈老师修书一封托为问候金庸。金庸见信，即





吩咐秘书：“是我老师的客人，快去请来！”见到家乡来客，金庸再三询问老师近况，还让人带上礼物。

1992年12月初，金庸终于重返家乡。他在杭州茶叶博物馆参观时偶遇陈未冬的小女儿陈琤，金庸惊喜道：“你是我的小师妹啊！”随即掏出一封问候信，让她带给陈先生。12月8日上午9时，金庸携夫人林乐怡女士来到陈老师家。“老师好！师母好！”金庸深深弯腰鞠躬，行了大礼。

时年68岁的金庸像小孩似的携着老师的手进了客堂，深情地说：“陈老师是我立业的启蒙恩师，我有今天离不开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老师教诲的恩德终身难忘。”金庸忆及当年：“我的作文中，将‘旖旎’两字错写成‘旖妮’，是老师翻出《辞源》予以指正。从此我写作遇到犹豫不决时常查辞书。”听说往事，陈未冬禁不住哈哈大笑：“良镛，你的记性真好，是啊，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师生交谈甚欢。金庸拿出自己写的《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等原版精装本，挥笔写上“恩师指正”等字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老师。

1996年11月5日，金庸在西湖边建造的“云松书舍”竣工落成，他又临杭州，特邀陈未冬出席晚宴。致词时，他十分动情地说：“今天我很高兴，在座的有我小学时的老师，他已经80多岁了，给过我许多指教和器重，我很敬重他……”返港那天，他亲赴陈舍，向老师和师母辞行，将一只封口的信封塞给老师，非常诚恳地说：“这是学生的一点点心意，请老师一定要收下，实在是不成敬意。”待金庸离开后，老师拆开信封一看，原来是一叠“人民币兑换券”，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是比较珍贵的，可以买到一般人用人民币买不到的物品。

“他考虑事情总是那么细致周到！”老师心中很是感动。

3

师生重逢时，金庸再三要求老师给他讲讲革命历史。于是，陈老师讲述了别后他奔赴延安然后潜伏浙南的经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师生离别，查良镛离开海宁念书，陈未冬则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曾聆听毛泽东和朱德的讲话。1938年9月初，陈未冬入党不久受派潜回诸暨，改名张光，从事地下活动。1939年6月，张光担任诸暨县委书记，以巽溪村为中心，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年间，璜山区有20多个村建立了支部，发展党员百余人。1941年3月，中共余姚县委特派





员张光带着夫人钟学意，第一次到达余姚境内的周巷，租赁老中医家的店面房子，开设一家旧木器商店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他与淞沪抗日游击队五支队取得联系，大量动员地方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部队，建立了通讯联络站、办事处等机构。

这年初夏，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张光任中共三北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并兼中共余（姚）上（虞）县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其间，领导虞北人民，高举抗日斗争旗帜，以各种形式打击日伪顽军，建立了虞北抗日根据地。

一天凌晨，张光到道林区与淞沪抗日游击队队长接头。刚拐上一条大路，猛听背后有人喊：“站住！”回头一看，只见三个壮汉疾步赶来，心知有异，却不慌不忙，反而迎上前去。张光说：“先生，我不认识你，你叫我干什么？”那三人只是吼叫：“走，一块儿走，上汽车。”这时候，张光才发现路旁停有一辆黑色汽车，心里全明白了：是日伪特务专门来抓他的，怎么办？得想办法逃！就在特务伸手来拉他时，他用手里的皮包猛然向特务头部打去，然后夺路欲逃。哪知特务早有防备，伸手抓住了张光的衣服后领。张光急中生智，撒手甩掉了皮包，两臂向后一顺，顺势脱掉上衣，向南急跑。“砰！砰！”特务连开两枪，张光顿时倒在地上。一颗子弹击中了张光的右臂。他左手扶着墙，站起来，用手捂住流血的伤口。特务一边骂着一边走到张光跟前，拉他上汽车。张光站着不动，说：“我受伤了，走不了。”特务一看，张光的衬衫已被鲜血染红，便放开手，转身去马路对面喊汽车。张光等特务走出五六步远了，突然转身向南，拼命猛跑，跑到南巷胡同口，急拐进去，继续奔跑。等特务发觉追到胡同口时，已经不见了张光的踪影。张光就这样脱险了。

解放战争中，张光从地方转入军队，随军北撤，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某师政治部干事，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解放后，张光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省委秘书处处长等职。1983年，从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任上离休。

2003年，在浙江大学的一次讲演中，金庸用崇敬的语气跟同学们讲述老师当年的潜伏经历，称赞说：“他是一个革命者，非常勇敢可敬！”

陈未冬教过的学生许多，唯独查良镛这个名字还记得。因为很喜欢这个学生，他一直把查良镛的一本作文簿珍藏在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间造反派多次抄家，这本作文簿才与被称为“四旧”的东西一起被烧掉。

2003年5月，陈未冬因病逝世于杭州，享年93岁。





今来旧址忆故人

——中学校长张印通

在碧绿的校园草地上，矗立着一尊铜像，碑额铭刻着“敬爱的张印通校长，学生金庸敬题”的字样。金庸面对铜像深深三鞠躬后，已是热泪盈眶。



张印通校长铜像（耕夫 摄）

那年，金庸来到丽水旧地，重游碧湖高中学校旧址时，勾起了他对昔日师友的无限情思，笔下一泻，竟有些感伤：“今来旧址忆故人，不见前辈心耿耿。”

在金庸感念的师友中，张印通是最为重要的人物。

1

1936年，少年查良镛在故乡海宁袁花镇的龙山小学堂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二中。美丽的南湖、古老的烟雨楼从此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个梦。数学老





师章克标、国文老师王芝籛等都让他终生难忘。

然而，1937年11月5日拂晓，20万日军在大雾的掩护下从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一带登陆，大肆烧杀，嘉兴危在旦夕，数百名无“家”可归的学生还留在学校，一时人心惶惶，陷入了一片混乱。校长张印通在危难之际，不顾经费不足和前途艰辛莫测，毅然挑起重担，带领师生南迁，甚至顾不上安置好自己同样处于危险与困境之中的家庭。11月11日，他们匆忙离开新滕，踏上了千里流亡之路。11月19日，嘉兴沦陷。

师生们从新滕出发，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于潜，最初是坐船，后来水路不通了，只好步行，跋山涉水，晓行夜宿。到于潜小驻，本来打算上课，11月24日传来了杭州沦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过分水到桐庐，半夜里，学生们在睡梦中被叫醒，匆忙集合出发，队伍刚刚走过浮桥，身后火光熊熊，浮桥烧断了。走出二三十里，天色微明，歇下来吃早饭。老师这才告诉他们，昨夜宿营处，日寇距离不过一二十里，真是惊险万状。

这些学生年龄大的不过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十二岁，还有女同学，虽说轻装前进，每人只剩下一条棉被、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但没有交通工具，完全是徒步跋涉，斜挂在背上的被子卷实在不胜其负，一般每天只能走三五十里，以至六十里。最多的两天，日行九十里，同学们脚上都起了水泡，水泡磨破了出血不止，只有靠一根木棒或竹竿支撑，一步一移。

张印通校长和师生同行、同吃、同住，每到宿营地，都是稻草在地上一铺，就地而卧。吃的同样非常简单，每次发一元钱要用好几天，师生们常常买三个铜板的山芋充饥，吃上一只粽子就是一顿奢侈的美餐了。在疲惫的流亡途中，老师仍然抓紧时间给学生上课，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学习用品，他们就在树荫、屋檐下，老师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来上课。

他们吃山芋，睡泥地，徒步跋涉了近两个月，行程千里，历尽艰辛，经永康、缙云，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浙南山区小镇——丽水碧湖镇。回忆起这段颠沛千里的经历，金庸后来说：“当时我们才十二三岁，每天要步行七八十里，餐风宿露，为抗日救国，我们跟学校到后方去。为救亡图存，我们努力学习。走不动了，就唱支歌……”

在“树凝碧，溪如湖”的碧湖，金庸穿上灰布军装，参加了战时青年训练团，接受军训。半年后，浙江北部沦陷区的许多中学辗转千里相继来到碧湖，教育厅决定将杭嘉湖的七所省立中等学校（包括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合组

